

探析艾略特诗歌的异化主题

——兼谈艾略特个人的异化感

林春香, 蒋显文^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艾略特一直强调诗歌“非个性化”,但他“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却以火一样的文字烙印在他的作品中”。文章结合彼得·阿克罗伊德的权威传记《艾略特传》,深入分析了艾略特个人的异化感及其诗歌中的异化主题,并探讨了引起诗人及西方现代都市人异化的根源及走出异化的途径。

[关键词] 艾略特; 异化; 异化主题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118-0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艺复兴以降一直牢牢统治着西方的理性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了人们的质疑,西方几百年来构建的信仰大厦开始崩溃,敏锐的知识精英们感受到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文明正在朝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发展,异化正在迅速蔓延,吞噬着人们美好的愿望^[1]。“人的异化,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丧失了自身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2]侯维瑞先生认为:“现代派文学中的异化,一般来说只是指在高度物质世界里的人的孤独与被遗弃感,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冷淡与隔阂以及人在社会上孤立无依,失去归宿。”^[3]袁可嘉则认为,现代派作家虽思考方式各异,但“贯串其中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它在人类四种基本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4]。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异化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异化的理解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异化在文学人物身上可表现为孤独、悲观绝望、冷漠隔绝等消沉的精神状态。而艾略特正是用诗歌描述了西方现代都市人的这种异化的精神状态。

一 艾略特诗歌的异化主题

20世纪的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矛盾激化,在这样一个比以往更加歇斯底里的时代中,人与人的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人们的自尊与自信每况愈下,而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却与日俱增,在这种危机四伏和荒诞不经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会备受精神痛苦的折磨,而且也难以避免患有病态社会中常见的各种弊病,其思维与言行

也显得不可思议。因此,不顾一切地反映现代西方人的异化感、焦虑感和绝望感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小说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表现了现代世界的异化现象和现代人的异化感。

作为开创英美诗歌一代诗风的先驱人物,艾略特敢于打破传统诗歌题材的限制,将诗歌从歌颂乡村自然风光转到描述城市丑恶现实,“从那没有诗意、从未开发过的材料中发现诗”。因此,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艾略特是用原本应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诗歌语言揭露了现代人的异化。另外,他将描写的对象聚焦于在物质生活上获得极大满足而精神空虚的西方现代都市人群体,描写到谈情说爱的情人,高贵的女士,孤独的小老头,冷漠无情的佣人等等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的异化。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了,原本应是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彼此相互隔绝、冷漠,无法沟通。如在1909年所作的《谈情说爱的一席话》中,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在谈话,可是双方都不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

我说:“看这个月亮,我们那多情善感的朋友!

也许(我承认,也许有些离异)

可能是普莱斯特·约翰的气球

或者是高高挂着一个破旧灯笼

给可怜的赶路人在奔向苦难时照亮。”

而她说:“你真能换题目。”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同样也是一男一女相遇,可是那个年轻男子不能言语,被禁锢于其思想之中。因此在这首诗中,女的只说不想,男的只想不说,形成隔绝状态^[5]。对于

[收稿日期] 2008-07-10

[作者简介] 林春香(1983-),女,福建漳州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艾略特而言,这种难以沟通的隔绝不仅仅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它可以扩展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关爱。如旅途上“赶骆驼的人咒骂着,抱怨着,逃走去找他们的烈酒和女人,篝火熄灭了,(我们)无处可以蔽身,城市敌视外人,小镇很不友善,村庄不但肮脏,索价更是昂贵;我们一路苦不堪言”(《东方博士之旅》)。海伦姑妈去世的时候,周围的人无动于衷,“殡仪馆的来人擦着他的脚”,那口德罗斯顿的钟在壁炉架上依旧无情地滴答走着。她尸骨未寒,男仆却急着与女佣寻欢作乐,一切并没有因为她的离去而改变,只有生前陪伴着她的鸚鵡随她而去,“不久也死了”(《海伦姑妈》)。

而且这些人不再具有光彩照人的特点,不再是具有一身豪气的英雄或迷人的窈窕淑女,他们既丧失了符合人性的外观,也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异化成丑恶的动物。如《情歌》中的普鲁弗洛克将自己想象成一只螃蟹,“慌张地爬过沉寂的海洋那样的地板”。《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主人公觉得自己“像一只手舞足蹈的熊”,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像一只鸚鵡那样啼鸣,像一只猢猻那样呼叫。”阿波利纳克斯先生枯燥而激昂的说话声成了“半人半马怪在坚实的草地上得得的蹄声”(《阿波利纳克斯先生》)。长着猿颈脖似的斯威尼是“脊椎动物”,在他看来,人类无异于动物,人生无非是“出生、交配、死亡”而已(《内心矛盾的斯威尼》)。

此外,他们的精神世界畸变了,他们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异化为内心空虚,“头颅塞满稻草”的“空心人”。荒原上的人们处于外部世界荒芜,内心世界空虚的荒废境地,他们精神恍惚,死气沉沉,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脑子里竟什么也没有”(《荒原》)。普鲁弗洛克无聊地用咖啡勺子量走了自己的生命,而他在客厅里看到女士们煞有介事地来回走动,以大谈米开朗琪罗来掩饰她们灵魂的空虚(《情歌》)。一个孤零零的遭受挫折的小老头,在枯燥的环境里,头脑变得空空,逐渐失去了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小老头》)。一只老蟹尚且会“咬住了我伸给它的一根棍子的一端”,而我却“从孩子的眼睛里看不见什么背后的东西”,“那孩子的手机械地/伸出来把一个沿着码头滚动的玩具装在口袋里”(《多风之夜狂想曲》)。正如泰勒所说的,对于这些人而言,“整个世界突然丧失了精神领域的衡量标准,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人们所害怕的是一种可怕的空虚,一种茫然或者说是一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人本身的一种陌生。”

总之,艾略特用讥诮和冷峻的诗歌笔调描绘出西方现代都市人异化的精神状态。他先于一般人观察到无聊的城市生活给现代都市人带来的精神无聊,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的物质文明给人们造成的孤独感、隔膜感和失落感。这是他的诗歌,特别是早期诗歌反复描写的主题^[6]。

艾略特在展示西方现代人异化的同时,还向读者暗示了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一方面是欧洲文明的瓦解和传统观念的崩溃。《荒原》一诗中,诗人通过神话的平行结构“把现代生活的事件与古代神话的事件相关或并置,使人突悟其间的相似性而又带有迥然不同的含义。”^[7]因此,从整体上说,《荒原》描写到两组人物群像:传统人与现代荒原人。对比

一下两组人物的言语与行为,我们不禁发现,其区别非常明显:传统人顽强、坚韧、执着、淳朴、忠诚;而现代荒原人猥亵、迷茫、庸碌、空虚、幻灭。如在遭受海难,父亲和船只都被大海吞没以后,斐迪南王子在为父亲的死感到痛不欲生的同时,不忘沉思这突然之间的灾难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要弄清楚“人生须臾之悲哀”的缘故。同样是面对厄运,玛丽作为奥地利王室的后裔在一战后流落到巴黎,面对日渐窘迫的处境,她却无力改变现实,也不愿去面对现实,只好沉湎于对往日美好时光的回忆,靠追怀往昔来满足虚荣心,消磨时光^[8]。通过众多对比,诗人的寓意逐渐显露:传统人那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顽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已不复存在,已建立的欧洲文明受到瓦解,传统观念已崩溃甚至沦丧。不得不“重估一切价值”的荒原人失去信仰寄托,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们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思想与观念的废墟中无以自持。另一方面是高度的工业化。艾略特认为国家越是高度工业化,物质主义哲学就越容易盛行,这种哲学也就越有害^[9]。在这样的国家中,传统社会的亲密关系受到破坏,人与人之间是背靠背的关系,由书面契约来决定。人们关心的是“利润与损失”,“心里老惦记着小费,还带着编造的生活预算”。在《水里的死亡》部分,诗人借用古代腓尼基人因沉溺于物质享受而衰亡的故事来暗示现代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享受与精神贫乏。工业化在导致人性扭曲的同时,还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比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提到的黄色的雾,便是从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工厂中冒出来的,这鹅黄色的雾是工业城市呼出的废气。泰晤士河两岸不再有欢快的歌声,到处是“现代的河上仙女”与“最后几个城里老板们的后代”厮混后留下的垃圾。

二 诗人的异化感

艾略特是个悲观主义者,内心充满沮丧、孤独和空虚。他与维芬·海格-伍德的婚姻是不幸的,两人之间始终有感情上的隔阂,夫妻生活极不协调,两人都深深地了解到单独相处时的无聊和空虚。维芬的神经质也经常使艾略特面色焦黄,抑郁寡欢,变得越发离群。他的一位朋友曾说:“我知道他极为孤独,甚至是过分的孤独。”埃兹拉·庞德的女儿在拜访了艾略特之后这样写道:“我见到了一位伟大的人还见到了孤独。”1926年2月份,他发了一次高烧,此时,他觉得自己的脑子再也无法使用了。他感到空虚,用《空心人》中的躯壳形容自己,甚至觉得他得永久地衰弱下去了。另外,虽然他是在不顾父母的反对之下走上创作这条道路的,但总是对自己的创作能力缺乏信心,以致于不敢冒险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写作。甚至在诗歌让他声名远扬的那些年里,他都没有放弃在费伯与费伯公司的那份出版工作,他觉得“有必要持一份别人认为是有用的工作”。艾略特还是个难交的朋友,读书期间,他“相当离群,沉默寡言,举止拘谨,既聪敏过人又有些冷漠孤高。”他不愿与任何人过于亲近,在与朋友们的关系中,总是“解冻”与“结冰”交替出现。当他与期望和他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人之间的来往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会立刻退步和抽身。可见,他是一个不愿让人理解,经常让

人迷惑的奇怪的人^[10]。

对异化的感知和认识不一定产生异化感,也不代表从作者身上可以看到异化。比如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人的异化,而且对其作了深入研究,但他自己并没有异化感^[11]。艾略特也一直强调诗歌“非个性化”,他认为“诗歌是有意义的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只活在诗里,而不存在于诗人的经历中。”^[12]但是艾略特“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却以火一样的文字烙印在他的作品中”^{[10] 322}。

如艾略特的自我意识中充满自我怀疑的成分,他总是关心自己的仪表是否端正,表现自我的方式是否正确,为了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很少在别人面前过多的暴露自己。在一次晚会上,艾略特喝多了酒,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他只能勉强地站起来和客人道别,这件事无疑让他觉得难堪,因为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出席晚会的佛吉尼亚·伍尔夫,为前一晚的行为道歉,足足花了十分钟。在普鲁弗洛克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怀疑成分。普鲁弗洛克向往爱情,却缺乏自信,精心打扮着自己,却又迟疑不决,不断的想象着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带着我头发中心的那个秃顶——

(她们会说:“他的头发真是愈来愈稀薄了!”)

我早上穿的外套,我的硬领笔挺地托住下巴,

我的领带华丽而又绝不刺眼,但为一只朴素的别针固定住——

(她们会说:“他的胳膊腿真的瘦了!”)

在《荒原》中,艾略特与维芬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体现。“对弈”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一对上流社会夫妇的生活。妻子虽然生活极其讲究,但感到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丈夫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的人,但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他任凭妻子对他吼叫,以冷漠对待无礼。同艾略特一样,他通过自己的内心视角,看到四周一片荒芜,尸骨遍野。这对夫妻已经失去了共同语言,他们的思想已经脱节。虽然我们不能把艾略特夫妇与这对夫妻划等号,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必定来自艾略特自己的生活。庞德认为这个有关“神经”的段落太直接,太逼真,简直像摄影似的。然而维芬读完这个段落却对之拍手叫绝,也许她对自己的问题被戏剧性地反映到诗中去而感到有趣^[13]。

在诗人展现的现代都市人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诗人自己孤独、苦闷而与人疏远的身影。那么,艾略特在描写和探索异化时为什么会流露出这么强烈的异化感呢?这与诗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仍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想是分不开的。

和庞德一样,艾略特认为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化氛围“稀薄”,而且很土,不利于自身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艾略特甚至认为波士顿人的思维方式是目空一切、怀疑一切,他把这看做是一个社会枯竭的象征,甚至在还没学完硕士课程之前,他就想逃离这里。于是艾略特最终决定离开美国,去欧洲寻找创作诗歌的梦想,并于1927年11月加入英国国籍。然而正是这一异国寻梦的决定使他失去归宿,不管在哪里他都没有归属感,独自品尝着孤独与寂寞。1910年,他来到

了“当时对他意味着诗”的法国,到达巴黎之后,艾略特却显得孤独和绝望。他曾回忆,刚到巴黎时举目无亲,而想要在那个城市生活得好,最好的办法是远离人群,因为这些人人都很“乏味、浪费时间”。我们看到,完成于此时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开头第一句便是“让我们走吧,你和我”,诗中也多次提到“我们”,但是“我们”中的“你”到底是谁呢?“我”的朋友,还是“我”虚幻的灵魂?笔者认为,《情歌》中的“你”正是孤独的“我”(亦或诗人)虚构的一位忠实的听众,只有这个虚构的“你”才会倾听“我”的故事,也许也只有“你”才懂得“我”内心的感受。

在诗歌的写作艺术上,艾略特创造性地结合使用了戏剧化、内心独白、客观对应物、典故、音乐性等手法,但这种复杂的创作技巧使得他的诗歌在表面上是一些互无联系的片断的排列,晦涩难懂。这样的诗歌虽然得到庞德等人的赏识,但在英国却得不到接受,甚至受到鄙视。当时的学术界名人哈罗德·门罗称他的诗歌为“绝对不正常”;评论界觉得它们只是诗行,而不是诗,因为从这里看不到“美”,除了有趣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没有诗意。这对于努力从事诗歌创作,决心在英国干出一番事业的艾略特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事业上的不得志,加上经济拮据与劳累的工作使艾略特情绪低落,并对自己诗歌的发展产生怀疑。诗人发出“(代表着希望的)雄鹰和号角在哪里?”的呐喊,得到的答案却是“深埋在阿尔卑斯山的积雪之下”,遥不可触(《一只宜煮熟的鸡蛋》)。

应该说,一个孤独苦闷的人最需要友情带来的安慰与鼓励。但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艾略特却总是保持一种冷漠而与人隔绝的形象。这一形象给他带来了更多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得不说保持这种形象对与他的创作来说又是必要的。移居英国之后,艾略特一直认为自己是“Metoits”(局外居民),在一个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他必须小心谨慎地移动着每一步,审视、吸收所有对他有用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的承认,他得“通过与适当的人交往,为(自己)将来的影响打下基础。”但是,他又必须与这些人保持距离,似乎“只要通过这种不彻底的归属,或不完全的介入就可以保持住自己的某种特性。”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智性上高于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作家艺术家,他发现很难向这些同代人讲明乔伊斯、刘易斯这些人的价值。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不屑于乔伊斯的人物之一,虽然艾略特和她成为朋友,但他们谁都不理解或欣赏对方的作品。另外,在疾病与工作占据他绝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以“沉默或避开人群的方式”为自己腾出创作时间。

三 寻求走出异化的途径

在很多诗歌中,艾略特虽然描写的是一个充满异化的世界,但是,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寻求拯救才是诗人描写异化的最终目的。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主张描写现代生活的肮脏面,化腐朽为神奇,在丑恶中见到美。他在《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指出:“什么叫诗歌?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艾略特无论从题材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和启

发,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最初从先行者波德莱尔那里发现了现代大都市生活的肮脏面,污秽的现实与梦幻的融合,现实和想象并置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任何一个用英语写作的诗人未开发过的。”^{[7] 149-151}在很多诗作中,艾略特将现代人异化了的丑恶现象“按原样呈现出来,却又使它代表远较它本身为多的内容”^[14]。如诗人经常运用丑、美组合成的混合意象:“从穿着泥污裙的过路人那里/投来一个漫无目标的微笑”(《窗前的早晨》)。“美德是我们的无耻罪恶强加于我们的。这些眼泪是那结满愤怒之果的树上摇落下来的”(《小老头》)。“保守的/社长/污染了清纯的微风”(《社长》)。“抱紧你胸口的花朵吧/你的脸色/显得又惊又苦”(《哀伤的少女》)。“他们不会去触动在音乐室里/受到磨损和疑问的鲜花”(《一位女士的画像》)。这些混合意象造成鲜明的美丑对比效果,激起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走向天堂,获得拯救。诗人之所以揭露现实世界异化了的丑恶与污秽,对异化现实予以惊心动魄的展示,是为了使人们猛省到人类沉沦的恐惧,呼唤人们走出异化,走向美好的“天堂”,这也是艾略特诗歌异化主题的实质。

虽然在生活和创作上艾略特有痛苦和绝望,但在绝望中,他也没有放弃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尽管诗人个人寻求的是宗教上的“外在权威”。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波浪起伏,都使他迫切地需要心灵上的稳定。为了寻求这种稳定,他把目光投向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为他提供了能够依靠的“外在权威”^[15]。在教堂中他可以找到宁静,在那里,“孤独的来访者”可以逃避尘世的喧嚣与污秽。在艾略特看来,这即是他自己的出路,也是他所展现的异化世界获得拯救的途径。他觉得,现代文明的衰败和人类道德的退化,仅仅依靠白璧德的“内心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类的宗教能力和从文明的根基着手才能找到解救的途径^[16]。在后期作品中,艾略特虽然也写社会的阴暗面,但他的目光却更多地集中在展示宗教带来的希望之上。发表于1930年的《圣灰星期三》一诗便充分表现了诗人通过对自己的灵魂拷问与煎熬达到了对自身的净化,摈弃世俗社会的种种诱惑,经过忏悔、祷告、炼狱来达到楼梯式的向上攀登,最终在基督教的灵光中找到安慰与归宿。诗中表达了与艾略特早期阶段诗歌中不同的景观:人尽管是软弱的,尽管是罪孽深重的,但是人还是可以借着上帝的力量达到精神的升华,正如诗中所描写的“白色的船帆依然飞向海的远方,海的远方”。诗人在诗的最后以祷告结束:

教我们操心又不操心
教我们坐定
甚至在岩石之中
我们安宁在他的意志之中

因此,我们从诗歌的结尾看到希望,而这都是由于上帝意志体现的结果。至此,艾略特在前阶段所描写的荒原人、空心人、小老头,不再是迷茫着、毫无灵魂,而是在上帝的意

志之中变得安宁,有了精神的寄托。^{[16] 216}

四 结语

艾略特,一位孤独、苦闷、淡漠的诗人,用其讥诮和冷峻的笔调描绘了西方现代都市人的异化,揭露了西方的物质文明造成的孤独感、隔膜感和失落感。对诗歌事业的不懈追求,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是诗人孤独苦闷的根本原因,“他为一个诗人付出的代价太高,遭受的苦难太多了。”^{[10] 322} 在为自己寻找心灵的依靠的同时,艾略特也为异化的西方现代都市人指明解救的途径,尽管这条途径是走向宗教,而不是献身于社会斗争。同时,艾略特也希望通过异化的呈现,来唤起人们对美好世界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 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
- [2] 转引任淑坤.试论《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人物异化[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9):28.
- [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
- [4]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
- [5]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798.
- [6] 赵萝蕤,张子清.荒原[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译序,6.
- [7] 转引蒋洪新.英诗新方向[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159.
- [8] 蔡玉辉,李培培.《荒原》中的诗化“我”及其诗学蕴涵[J].外国文学,2005(5):97.
- [9]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5.
- [10] 彼得·阿克洛伊德:艾略特传[M].刘长缨等译.北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 [11] 肖明翰.文学中的异化感与保守主义[J].外国文学评论,1994(1):67.
- [12] 李赋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11.
- [13] 张剑.T.S.艾略特内心深处的《荒原》[J].当代外国文学,1996(1):145-146.
- [14] 王恩衷.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13.
- [15] 张剑.《空心人》与T.S.艾略特的思想发展[J].国外文学,1998(1):54.
- [16] 蒋洪新.英诗新方向[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183.